

借鉴与发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总体运思

李金铮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中国当代社会史亦称中国现代社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是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一门学问。它既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支,也是中国社会史的分支,还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分支,也可说是研究方法和视角相互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当代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所有历史,不仅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也包括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多元化的,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外,还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整体史观和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鉴。资料来源也是多样化的,既有文献资料,也包括实物资料、视觉资料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文献、口述资料和文学资料。中国当代社会史尚处于初级阶段,应“专通并举”相互促进,既应着力于具体研究,在学习和借鉴已有成功论著的基础上前进,又要努力构建较为合理的中国当代社会通史体系,明确其研究内容、历史分期、基本线索等。这一任务非一蹴可就,须逐步完善。

[关键词]中国当代社会史;借鉴与发展;运思

[作者简介]李金铮(1965—),男,河北省献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4-0045-07 [收稿日期]2012-02-18

一般来说,具体的历史研究总是先于某一历史领域或历史学科的形成,中国当代史(或称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是如此。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分别成立于1990、1992年,大致标志着中国当代史学科的形成,但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就开始受到关注、记录和思考,如今这些文献大多已成为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而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主要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

与中国古、近代史相比,中国当代史距离今天最近,无疑是非常年轻的学科。而在此学科之中,中国当代社会史又是最为年轻与薄弱的领域。尽管如此,与之相关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且已有学者开始自觉从学科建设角度不断提倡。中国社会史复兴的开拓者冯尔康于1987年发表文章指出,历史学一定要遵循厚今薄古的原则加强现代史的研究。社会史研究要更多地从现实出发,而与现实联系最紧密的是近现代社会问题,故建设社会史学必然会强调近现代史研究。故可以

说,开展社会史研究会促进史学研究重点从古代向近现代的转移^{[1][P16]}。

但也许是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政治、经济史先行,中国当代史学者对此并无多少反应^①。直到2001年,杨凤城才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断代性质的全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写社会和普通人的活动。在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层面上的活动研究颇多,而对社会活动和状况的研究则明显薄弱。并指出,只有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全貌^[2]。2007年,田居俭首次发表关于加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专门论文,他指出,业已出版的社会史著作,不仅没有一部权威性的中国当代社会史,而且没有一部包括中国当代社会史的中国社会通史。无论从中国通史的一个断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角度审视,还是从中国正在经历并将长期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史(社会主义史)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代社会史都是一个必须填补的空白区域^[3]。此文可以说吹响了当代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号

①笔者曾发表过《中国现代社会史研究刍议》(1998年4月10日《光明日报》),虽然文中仍以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立论,针对社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中国近代,呼吁加强中国现代社会史的研究,与现在的中国现代或当代并非同一时间概念,但就方法论而言,仍基本上是适用的。

角。而后 姚力发表了更加全面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方法论的论文^① 行龙强调将社会史角度引入中国现代史研究^[4]。2010年,当代中国研究所还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机构——社会史研究室。此外,专题性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学术研讨会也陆续召开,如“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山西太原)、“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现状与学科体系学术研讨会”(安徽芜湖)、“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河北保定)等。诸此都表明,中国当代社会史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或学科正在形成之中。在此过程中,笔者认为,相关学者一方面应继续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应该从学科建设角度积极参与讨论,尽早明晰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概念、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以促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稳步发展。与19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史开始复兴时相比,现在讨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方法论问题,显然是方便多了。中国社会史复兴以来的三十年间,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具体研究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些成果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板。当然,有的问题还争而未决,我们仍要从中国当代社会史的角度进行讨论;有的方面,虽然道理相似,但内容有别,不可完全拷贝,须体现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时代特征。对于以上问题,笔者略陈管见。

一、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概念、学科属性与研究对象

中国当代社会史,也可称为中国现代社会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如作笼统地表述,它是研究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及其规律的一门学问。可见,中国当代社会史具有学科性质。之所以如此,可从两个角度解释:

第一 从历史学的时间概念理解。

中国新史学的先驱梁启超说,历史含继续性,本不可分,因为总史不易研究,才分为若干时代,时代的专史就是从所谓断代为史^{[5] P190}。1949年以来的中国史,如上所述具体研究早已开展,但直至2011年,在国务院和教育部颁布的最新学科目录中,才开始有了明确的学科定位,即属于中国史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称为中国现代史。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史

(1919—1949年)已经正式被划为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的一部分。就此意义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史应为中国史学二级学科中国现代史的分支,称为中国现代社会史最为恰当。但由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史概念还不可能很快消失,故称中国当代社会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也无不可。

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近来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看法,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近代史的特征就是近,故不仅包括1840—1949年的历史,也包括1949年以来的历史^②。这样一来,所谓的中国当代史或中国现代史竟归属中国近代史了。此说是否正确,有待讨论。笔者认为,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现代,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反映社会形态的概念。1949年以来与1840—1949年为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宜混淆。此外,就时间而言,近代、现代是一个变动概念,几百年之后,现在所说的近代、现代是否还能称之为近代、现代,是大可疑问的。不过,如果从国家政权更替的角度进行时期的划分,则是永远不变的,比如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存在^③。

第二 从社会史的概念理解。

如果社会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或历史学的分支,那么,中国当代社会史可以说是社会史学的分支,或者是中国历史学分支的分支。

学术界对社会史的学科定位一直存有歧义。其中,有三种意见最具代表性:一种是专史,就是与其他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史相并列的学科;另一种是通史,即反映历史全貌的历史;还有一种是社会史不能构成学科,其原因或者是社会史与其他专史的内容多有交叉和重复,很难有独立性,或者是社会史只是指整体史的研究范式或研究视角。笔者不赞同通史说,因为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没有区别;也不同意所谓内容交叉而学科很难成立说,因为几乎所有的现代学科都存在一定内容的交叉,但这并不影响学科的独立性。至于专史说和范式说,则各有其道理,并非截然对立。任何学科包括专史,也可以说是一种研究范式或研究视角。社会史就既可以认为是专门史,也可以说是从社会史视角认识历史的一种方法,还可进一步说是从整体史观认识历史的一种方法。但反过来

^①参见姚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②参见姜涛《近代史就是要近》(载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第8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20世纪上半期《中国近代史》的一些编者就是类似的思路,他们一般将近代史的下限截至他们生活或距离他们很近的时代。按此逻辑,姜涛的看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如何确定“上限”?

^③除上述看法之外,还有学者将1970年代末作为中国当代史的开端。参见谢晖《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乡规民约及其遭遇》(载衣俊卿主编《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下,第688页,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则不一定成立。整体史观不能说仅仅限于社会史,而是适用于所有历史学科。所以,专史说最为合理,中国当代社会史应该是专史社会史的分支^①。

此外,社会史也是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从这两个学科本身而言,社会史作为社会学、人类学的分支也未尝不可。正如经济史,既可以作为历史学的分支,也可以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只是研究视角有所不同和区别罢了。作为历史学者,自然是偏向于从历史学、从社会史角度看待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学科属性。

再谈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

笔者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与整个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一致的。问题是,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学术界同样未达成共识。即便同持专史说,也有不同的理解。如有的学者指出,社会史是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围;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和社会制度、社会变迁;还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史研究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凡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问题等等,都属于社会史的研究范围。而持通史说、范式说的学者又认为,社会史研究无法脱离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故其研究对象应是历史的全部。有的当代史学者也试图提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对象的想法,认为当代社会史系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生活与社会管理的变化过程及其规律,与上述说法有所不同^[6]。

无论对学科属性,还是研究对象,之所以众说纷纭,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史和其他学科相互渗透、边界模糊、难以界定有关。譬如,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专史的内容有部分重合,但侧重各有不同,像家庭、婚姻、社团的历史只能归属于社会史,而无法归属于其他学科;有的学者指出,政治史、经济史等专史中属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者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但比如赋役制度、职官制度、商业贸易、交通运输、教育制度等就不是社会史所能涵盖的,它们纯粹是政治史、经济史、教育史的内容。但在笔者看来,家庭、婚姻和社团同样可以归到文化史、经济史之列,而赋役制度、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也很难说就一定不能归到社会史范围。还有,经济史就不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了吗?回顾社会史学的奠基者——年鉴学派产生的历史,他们开始研究的主要就是经济史。可见,试图

将社会史内容与其他专史严格地区别开来,是非常困难乃至不可能的。这种难以划分和区别,也正成为有的学者反对社会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理由。

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社会史与其他专史之间划定一个清晰有别的内容范围,而是要弄清社会史的特质是什么?社会史与传统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与国家史、精英史相对的民间性和民众性,社会史研究的是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历史。这一点,不论在西方社会史还是中国社会史学界,不论对社会史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有何争议,都是一个普遍的倾向。而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社会史,就不仅仅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以前所谓社会史的内容,也包括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简单地说,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一切历史都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这一界定,与现在所谓社会史的通史说、专史说和范式说都有所不同。因为通史说、范式说都不是专指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尽管后者可能以此为主),专史说则不包括政治、经济等内容(尽管声称有联系)。在此基础上,以上所谓家庭、婚姻、社团、交通运输、商业贸易、教育制度是否属于社会史的争论,就可迎刃而解,即只要发生在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之中,就属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

有了以上讨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就很清楚了,它是研究1949年10月以来中国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总体史。至于其具体研究内容,则异常丰富,可进一步详细分类,无须赘举。笔者同意“社会史一向以多多益善为原则”^{[7] P174}。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挖掘历史内容、由未知到已知的过程。近年来,历史学尤其是社会史学界掀起“碎片化”的讨论。的确,一些研究缺乏宏观史学的关怀,但过于夸大也可能不利于史学的发展。其实,我们现在仍然缺乏高质量的具体研究、碎片研究。没有碎片,何来整体?对一个仍在孕育过程中的中国当代社会史而言,更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警惕“碎片化”。倒是有一点应该提醒,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当代社会史有了许多过去不曾有过的新内容,比如土地改革、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文化大革命”、农业生产责任制、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等等,在普通民众也都有突出表现,最值得关注和探索。

二、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历史研究与理论、方法的关联,是无须多加强调

^①年鉴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布罗代尔强调,历史学可被分为众多的专科,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艺术史、思想史、科学史、技术史等等(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500—50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可见,社会史可作为专史。

的。历史学家谭其骧说,做历史研究工作若拿工业生产作譬喻,那么资料就是工业原料,理论就是生产工具^[8]。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理论与方法的指导,资料仍然是一堆资料,几无学术研究可言。

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社会史尤为重要,社会史的价值绝不是仅仅在于研究领域的扩大,更是因为理论和方法的变革。对于扩大了领域和课题,如果仍只是用传统思维进行研究,并不能称之为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

由于社会史所涉内容包罗万象,其研究理论与方法无疑是多元化、多样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马克思、恩格斯本来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先行者,其《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都关涉到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即便是欧洲年鉴学派,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9] P261}。有的学者还强调,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无疑,它既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指针,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有不可或缺的联系。除此以外,笔者想强调的还有三个方面:“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整体史观和借鉴相关学科理论,这几个方面与以上史观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

第一,“自下而上”的视角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立场。

无论是西方社会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中国社会史学,其最突出的特征是民间性和民众性。而这一特质,均来源于对传统史学只注重政府、精英、重大事件的不满。以中国传统史学为例,政治制度史、精英思想史、重大事件史几乎代替了整个社会的历史,这就是20世纪初梁启超所提出的,“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谱而已;知有个体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10] P279}。也正因为此,“史家的眼光始终是‘自上而下’或‘自上而下’的,即使当他们偶尔关注普通人的历史时,那也已是精英历史的附属、延续或残余,或是不自觉地居高临下地审视它,而不是设身处地地同情理解它”^{[11] P12}。迄今,该思维方式在中国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当代史、中共党史领域仍有极大统治力,中国当代史几乎成了领袖思想、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及其执行的事件史,鲜有集中研究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内容。

强调社会史视角正是力求纠正这一弊端,以“自下而上”的立场研究历史。正如有的学者以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为例所强调的,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就是要给基层农村和广大农民更多的关注,从农村和农

民的角度,“理解的同情”出发,站在地下看天上,站在地方看中央,上下贯通,左右相连,整体地全面地了解认识和认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在高度政治化的“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社会和亿万农民仍有其自身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方式,大势所趋的汹涌波涛底下仍会有潜流或暗流的涌动,全面地、完整地、系统地看待历史,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诉求,亦是我们更加全面地完整地认识这个时代的基本出发点^[4]。

当然,“自下而上”并非完全替代“自上而下”。中国自古以来,国家总是支配和决定着普通民众的命运。在中国当代,更可见到国家塑造的巨大力量。所以,“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对认识中国历史仍有其方法论价值。由此,笔者认为,极端地偏向任何一方都不符合历史事实,从国家政权与社会的上下互动做双向探讨也许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只是因为社会史是研究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历史,自然是以下层视角为主。

第二 整体史观是社会史学者的根本追求。

笔者所理解的整体史理念主要包括三个层次,首先,不断挖掘和扩大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内容,逐渐向着中国当代社会总体史逼近,此一道理前面已述,此不赘。另两个层次对社会史研究更具指导意义,也可避免就事论事的“碎片化”现象。

一是以整体史观指导具体研究。其中又有两个含义:其一是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对象置于大的整体史之中,即注重研究对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联系、当代社会现象与古代、近代社会现象的长时段比较。恩格斯曾批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2] P389}。其二是以小见大,以具体研究反映中国当代史的宏大问题意识。表面看,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似乎与宏大历史问题相对立,实际上并非不关注宏大历史问题,只是视角不同,它是“自下而上”,以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立场来反映和认识中国当代史的宏大问题。对此,梁启超曾有过阐述:“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于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5] P136}?另外,宏大问题还可从中国现实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来理解,也就是说,“历史学家以当代人们所关心的重大事情为出发点,去重新思考过去的某些重要方面”^{[13] P35}。而民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往往是与其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矛盾最为突出或集中的问题。

二是宏观史学是整体史的最高目标。它又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全面、综合、系统的研究,也就是对历史的各个方面要加以综合考察。譬如,中国当代一个区

域的社会史、中国当代社会通史都能反映全面、综合、系统的研究特征。其二是重视理论思考,从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视角探讨中国当代历史的命运和规律。需要注意的是,历史思考应该是批判性的,历史思考不等同于维护和注解既有的理论模式,更不是附和意识形态。必须承认,近些年简单的个案描述较多,对历史理论的思考极其缺乏,理论贡献委实鲜见。

第三,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社会史学者的必备工具。

社会史内容几乎包括民间社会、普通民众历史的全部,从而也就决定了社会史研究对其他学科知识、理论和方法的依赖。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辛西亚·海伊所指出的,历史学须仰赖其他学科提供理论或结构。没有外在的支撑,历史学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缺乏钢骨的世界。历史学家无法自行归纳出理论结构,而必须从其他学科输入。在科学面前,历史的地位本质上是寄生式的^{[14] [P27]}。相关学科的范围极其广阔,几乎囊括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门类,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人口学、语言文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等。只有借助这些相关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才能对社会史现象作深入分析。比如,研究民众的生活水平,可利用恩格尔系数作分析,由此改进模糊的定性描述。

但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防止社会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社会科学化就是抽调历史的具体形式,变成了社会科学式的分析,历史学失去自我,沦为社会科学的附庸。二是防止“见社会不见人”。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史,易陷于结构分析和总括模式,从而忽略了人的表现。正如费孝通所说的“没有充分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我虽然看到现在的农民饱食暖衣,居处宽敞。生活舒适了。我也用了他们收入的增长来表示他们生活变化的速度。但是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都没有说清楚。原因是我的注意力还是在社会变化而忽视了相应的人的变化。”^[15]三是防止社会科学理论的僵化。社会史研究不仅是运用已有的社会科学理论,还要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对其进行修正和发展,真正提供有价值的理论贡献。

三、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资料发掘

如前所述,历史资料就如工业生产的原料,没有原

料的生产是不可想象的。历史学家傅斯年有一名言:“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16] [P181]}陈寅恪也指出“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17] [P26-27]}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更点出了历史学的宿命“历史学家永远是自己资料的奴隶。”^{[18] [P6-7]}

凡属认真的历史学者,都将“竭泽而渔”视为搜集资料的根本法则。尽管如此,谁也不敢说自己已经找到了所有能收集到的证据,只是尽了最大努力而已。

中国当代社会史与整个历史学一样,资料类型是多元的,既有文献资料,也有实物资料,还有视觉资料、口述资料等。与古代、近代相比,当代史资料的搜集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有两点:一是由于距今较近,无论是报刊资料、档案资料还是民间文献,保存数量都较多;二是亲身经历者大多仍在世,便于调查。不利之处也有两点:一是有一些官方档案还未解密^①;二是历史资料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正确解读有较大难度。于此,笔者仅侧重谈民间文献、口述资料和文学资料。

民间文献,也就是收藏于民间的文献,包括契约、文件、族谱、账簿、信函、日记、笔记、碑刻等,与社会史关系最为密切。这些资料处于散落状态,消失越来越多,亟待抢救。近些年来,历史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史民间文献的搜集,以山西大学、南开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成就最为突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行龙教授的率领下,师生“走向田野与社会”,在山西各地已搜集到一百余个村的民间文献,总量达数百万件,内容包括各类账册,从中央到生产小队的各类文书,各种个人与家庭档案,各类宣传类资料,以及各类票证等,已成为迄今规模最大的集体化时代民间文献中心^[4]。他们利用这批资料编写出版了《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反映了北方农村集体化时期的历史变化与社会面貌。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思教授与他的学生也一直致力于当代华北乡村民间文献的搜集,已获得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邯郸市临漳县与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三个村落的档案文书,以及河北省邢台县前白岸公社党委书记乔钦起的工作笔记。数量虽远不及山西大学,但每个村庄的资料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连贯,仅侯家营村文书的目录索引就编出三十余万字。以上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所收集的资料,均受到国内外

^①需要说明的是,当代史早期档案尤其是地方档案馆收藏档案,能够利用的越来越多。如曹树基领导的团队在上海、江苏、浙江、河南、安徽、云南、山东、江西等8个省、市的50多个县(市)完成了约100万页1950年代县级档案的收集。参见曹树基《1950年代调查中所见中国近代社会》(载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第272—27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学者的高度关注 期待整理出版 嘉惠学林。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将搜集范围扩大到整个城乡,整理出版了《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系列,管见所及已有《河北冀县门庄公社门庄大队档案》、《师院图书馆会议记录》、《物资局整风鸣放材料》、《茶厂 1957 年整风大字报》、《花岭大队表格》等。据笔者所知,河北大学亦有学者搜集了不少日记、笔记、文书资料。

口述史料 是历史学者通过访问当事人而形成的资料,内容鲜活生动,具有补充文献资料的功能。与当代民间文献相比,抢救口述史料更时不我待。如果说民间文献也许还能继续存留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当事人很快就会过去,一个老人就好比是一座图书馆,一旦过去,保存在他们身上的历史记忆就永远消失了。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做了口述访谈和整理工作,涉及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农村妇女、插队知青、赤脚医生、工农兵学员、农业生产责任制等。譬如孙立萍主编的《口述大寨史——150 位大寨人说大寨》(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8 年版)就是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对一百五十位大寨人进行的实地访谈,重现了大寨村从 1947 年互助组开始到 2007 年六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囊括了大寨的村政、经济、文化以及村容村貌、乡风民俗的方方面面,反映了大寨由普通到辉煌再回到寂静的过程以及大寨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又如张凯宇主编的《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是云南医学院健康研究所与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的学者对云南、山东等地 40 余位曾任赤脚医生的进行访谈,再现了赤脚医生的个人经历、家庭状况、生活环境、工作负担、社会角色以及与村干部、群众、患者的关系等。当然,就总体来看,口述史界主要还是集中于名人和重大事件的访谈,而对普通民众的访谈仍然较少。而且,从事者大多未受过口述史学的正规训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口述资料的质量。

无论是民间文献还是口述资料的搜集,田野调查都是最重要的方法。同时,田野调查既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态度和精神。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9] [P790]}

文学史料 是将文学作品用于历史研究的资料,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显然,从文学作品中不能

找到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具体时空中的言论与行为,但如果想从中了解那个时代的风土民情、社会心态、日常生活乃至民众参与政治、军事、经济活动的表现,则必有所获,而这正是社会史研究需要的资料。如《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等都是描写中国农村合作化曲折历史的作品,反映了贫下中农、地主、富农对合作化的不同认识和复杂关系。以现在的眼光衡量,这些作品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痕迹,但基本上还是反映了集体化时代的农村面貌,可以作为研究这一时期社会史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与官方和私人有意识的记载史料不同,文学作品是无意记载的史料,一般故意作伪的可能性较小。在此意义上,胡适认为“杂记与小说皆无意于造史料,故其言最有史料价值,远胜于官书。”^①史学大师陈寅恪以唐诗证史,宋史学者利用《三言二拍》研究宋代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意识,明清史学者利用《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研究明清时代的社会面相,无疑都对当代社会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所以,不能不说,当代社会史学者对文学作品的资料价值重视很不够,用之于研究者则更少。

综上所述作一概括:中国当代社会史是研究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及其规律的一门学问。它既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支,也是中国社会史的分支,还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分支,同时也可说是研究方法和视角。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当代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所有历史,不仅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也包括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多元化的,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外,还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整体史观和借鉴相关学科理论。资料来源也是多样化,既有文献资料,也有实物资料、视觉资料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文献、口述资料和文学资料。以上认识,都为了一个目的,即推动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全面发展。当然,其中有一些观点对整个社会史的研究也许是有益的。此外,笔者还想补充的是,中国当代社会史尚处于初级阶段,应“专通并举”相互促进。一方面,应着力于具体研究,在学习和借鉴已有成功论著的基础上前进。譬如,欧美学者勒华·拉迪里的《蒙塔尤》、卡罗·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探讨了中世纪法国、意大利的乡村社会生活,皆为“以小见大”的典范之作。中国当代农村社会史研究也有值得关注的专著,如爱德华·弗里德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陈佩华等《当代中国农村历史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

^①转引自阿风《徽州文书与明清中国女性史研究》(载李江等《历史、史学与性别》第 77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村》、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等，都探讨了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变化。相比而言，中国当代城市社会史的研究较少，但也有可以推介之作，如金大陆的专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论文有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王笛《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1950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等。与此同时，还要努力构建比较合理的中国当代社会通史体系，明确其研究内容、历史分期、基本线索等^①。这一任务非一蹴可就，须逐步完善。可以相信，中国当代史尤其是当代社会史是中国史学界一片最有潜力的沃土，只要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就一定能结出累累硕果。

[参考文献]

- [1]冯尔康. 中国社会史研究[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 [2]杨凤城. 关于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1(3).
- [3]田居俭. 把当代社会史提到研究日程[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7(3).
- [4]行龙. “自下而上”: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4).
- [5]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 [6]朱佳木. 努力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1(6).
- [7]乔伊斯·阿普尔比.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8]谭其骧. 对今后历史研究工作的四点意见[J]. 社会科学, 1983(5).
- [9]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10]梁启超选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11]赵世瑜.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12]黎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13]勒鲁瓦·拉迪里. 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4]S. 肯德里克, 等. 解释过去, 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15]费孝通. 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J]. 北京大学学报, 1994(1).
- [16]傅斯年选集[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 [17]俞大维. 谈陈寅恪[M]. 台北: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0.
- [18]马克·布洛赫. 法国农村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9]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Reference and Development: General Tendency of Researches of Social History

LI Jin-zheng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e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changes and rule, whose research objects include social formation, social life, social relationship, folk society as well a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of the commoners. It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ory are diverse, such a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angle of "from above to below", complete view of history and relative theory. The sources of materials are also diverse, including physical information, visual information, folk literature, oral information and literary informati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is in the initial stage, so special history and general history are both needed to promote each other, forming a proper system of soci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ontents, historical division, basic clue and so on should be made clear, which will be improved gradually.

Key Words: soci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reference and development; thinking

[责任编辑、校对: 把增强]

^①此文写完后，笔者看到2012年3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报道的一条消息，即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张静如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五卷本）出版座谈会，这应当是首部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史的著作。